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人 民 大 版 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ДЕТ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ЛЕВИЗНЫ»
В КОММУНИЗМЕ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
人民出版社 喜香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125印张 71,000字

1949年9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3版

1975年3月北京第11次印刷

书号 1001·25 定价 0.23元

目 录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3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5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8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 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3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 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20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27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36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46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57
十 几点结论	69
增补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83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85
三 意大利屠拉梯之流	87
四 由正确的前提出发的错误结论	89
五	93
怀恩科普的来信	94
注释	95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¹

写于 1920 年 4—5 月间
1920 年 6 月出版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
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原文是俄文
本书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31 卷，这次排印第三版时，
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
一次校订

—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新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极大的区别，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不，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也就是说，把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

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错误。可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出，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更常见的，与其说是懂

得了一点，还不如说是他们由于革命阶级的本能而了解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国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Sozialistische Bücherei, Heft 11; Ignaz Brand①），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整个思想进程和整个思想范围，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思想糊涂、见识迂腐、手段卑鄙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这一切还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批评，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去作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他预见到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到来，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下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现时”（与1848年相比）“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斯拉夫人那里去了。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十九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俄国从西方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性，也许现在它本身已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

① 《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编者注

的泉源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重新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早已不再是西欧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回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崩溃得更快一些。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牺牲的实在太多了——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了社会革命的幼苗，并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写得多么好呵！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英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

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

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具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四十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的布尔什维

主义，经历了十五年（1903—1917 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在革命经验方面，或在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也就是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革命运动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这样多的经历，即使接近于这样多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如此丰富地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并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且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当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 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 年）。处处都感到伟大的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在酝酿着和准备着。国外的侨民报刊，在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三个主要政派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 1905—1907 年间以及 1917—1920 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

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更确切一点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形成着各种真正阶级的政治思想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所必需的政治思想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性和尖锐性在世界上都是见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在自发的斗争发展中，诞生了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当时关于苏维埃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的策略和参加议会的策略的更替，合法斗争形式和不合法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互相配合、互相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每一个月所受的政治科学基础的训练，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大步向前迅速发展。非阶级的、超阶

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的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存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连纳事件发生以后，便稍微快了一些。在1905年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莫大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必须利用的“合法机会”配合起来，那末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工人选民团中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

有这些各色各样的观点，都在侨民的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轻蔑地、高傲地耸起鼻子，嘲笑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机会”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几个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讨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派以及“考茨基派”，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 1917—1920 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 1914 年末起，就已无情地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² 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³ 首领、费边社分子⁴ 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恬不知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 年 2 月至 10 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老朽和腐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反对自己的莫大的破坏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一变而为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政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从前议会（虽然是反动透顶的议会）的反对党领袖的称号，使这种领袖容易在革命中继续起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出色地掌握了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一切方法和手腕、论据和诡辩。我们现在读到一切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社分子及独立工党领袖等等的文字，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

们早已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真是历史开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现在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估计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主要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⁵、法国龙格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和表现了糊涂观念，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不善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象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不善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在各处都破产了。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反对议会制的（实际上是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而所作的准备也绝不象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上述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要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些，而“工农”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则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议会制的共和国更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详的、仔细的、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

在 1917 年 10 月取得胜利，也不能保持住这个胜利。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 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 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 1914 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在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讲到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情形就不同了。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得还很不够。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

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而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尽管俄国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大于西欧各国，但是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毫无疑问，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的布尔什维主义。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有可能发展得非常茂盛，因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就特别巩固了。布尔什维主义承受并继续了这一斗争，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作了斗争。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第二、这个党认为它的独特的“革命性”和“左的精神”，在于它承认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摒弃这种手段。自然，我们所以摒弃个人恐怖，只是因为这种手段不适当，至于有些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一般地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因遭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围攻而采取的恐怖手段，那末这种人早在 1900—1903 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第三、“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的“左的精神”就在于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这里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证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还在 1900—1903 年间就要求开除伯恩施坦的党籍，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 1913 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最近似革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现在 1920 年，在经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一切政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政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无论在斯巴达克派⁶那里，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失节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果我们现在总地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起到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时止这一完全终结了的历史时期，那末，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一般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轮廓。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

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直接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而直截了当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机会主义国家观，可是这封信却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隐藏了三十六年）分不开的；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杰出的革命家，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的论据，是1905年抵制议会的成功经验。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谐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也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而且当时的斗争是由这样一个问题引起的，即让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议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后来，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和速度是否相同，所以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

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拒绝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模仿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①，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纠正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的迅速高涨并且转为起义，另一方面，正在维新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整个历史环境，迫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这个历史时期已经完全终结，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现在如果回顾一下，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组织（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

1918年事情没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时“左派”共产党人只是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或“派别”，而且为时不久。“左派共产党人”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同志，就在这一年都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原来认为布列斯特和约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说来，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这的确是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但这种妥协在当

① 关于个别人所说的话，作相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柏利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总是首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回答说：

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考茨基派与他们大同小异），奥国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说伦纳之流的先生们了），法国的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独立党人”、“劳工分子”（“拉布分子”⁷）等，在1914—1918年间以及1918—1920年间，同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有时甚至同“盟国的”资产阶级强盗们实行妥协，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那时所有这班先生，才真是强盗的同谋者。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愿意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哪种具体情况下的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决不许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和议会的奸诈之徒，拿“一般

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现在英国工联“领袖”们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正是这样来卸脱他们实行叛卖，实行这种实际上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变节和叛卖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一点在政治上决不是总象这个幼稚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应许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

为了不给人们留下曲解的余地，我试把一些基本情况提出来（即使是十分简单地），以便对具体的妥协进行分析。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同德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的党，从1914年末以来就在实际上制定了它的国际主义。它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战争时就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制失败的主张，敢于痛斥“保卫祖国”的谬论。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不去谋求资产阶级政府里的大臣职位。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又使这个党受到了极大的新的考验：它不同“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实行任何妥协，而准备推翻他们，并且把他们推翻了。这个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便彻底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这个党一面公布和废除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秘密条约，一面向各国人民建议和平，只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者破坏了和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做了人力所及的一切来加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强盗的暴力之下。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

看到，这样的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这样的妥协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1914—1920年间世界上第二国际的一切领袖一样)，一开始就实行叛卖，直接间接地为“保卫祖国”辩护，即为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实行叛卖，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起来反对本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他们在俄国起初同克伦斯基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同盟，后来又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结成同盟，正如他们国外的同道者同各该国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一样，都是倒向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自始至终在于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有一本表现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之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明白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认识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就政治方面看来，这个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呢，还是无产阶级？……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号一律按照原文）

往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它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它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的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这本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政党的一切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合于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下投入革命斗争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及阶层包括进来，就必须建立基础最广泛和范围最广大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一切革命分子汇集的地点，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听从‘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集合在这里。在这里，把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以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可见，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赞成议会制度，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种斗

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斗争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地参加过1903年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或是密切地观察过这一运动发展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陈腐的、早已听腻了的废话！‘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煞费苦心，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为什么不要这简单明了的道理，却要来这一套胡说八道呢？来这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①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的普通、正常和简单的关系，把人们的思想弄糊涂了，陷于困惑莫解的地位。在德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国家

① 沃拉皮尤克——是德国人施莱艾尔于1879年所创立的一种世界语，并未流行于世。——译者注

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按期举行的代表大会遵照正确手续来自由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刊以及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等方便办法来检阅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内战的扩大，不得不抛弃这种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式，二者结合使用，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组成或保留“一批领袖”，在这个时候，人们张皇失措，臆想出了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由于荷兰“论坛派”⁸ 不幸生在一个小国，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从来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陷入了迷途，茫然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不加思索，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现代的“时髦”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且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会想一想这是什么对什么的关系，不会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1892 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中分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总是投奔到资产阶级方面，直接间接接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混蛋们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指责他们是叛徒。最新的（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替某些先进国家创造了垄断的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内到处出现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班家伙，他们只顾自己本行业的利益，只顾工人贵族自己本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

动阶层，脱离了多数的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过去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堡、沃尔弗海姆、霍纳^①、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艾列尔^②，就是这样的新领袖。艾列尔企图使问题“深入”一层，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必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这就是从反对派那里得出的结论。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而纵容这些行为，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认党性就意味着不是从资本主义

① 《共产主义工人报》10(汉堡 1920 年 2 月 7 日第 32 号所载卡尔·艾列尔《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先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若不先摧毁政党，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曼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昏乱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艾列尔和克·霍纳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曾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特别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完全不适当的议论。要知道，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还是不能避免错误的。俄国人特别清楚这一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特别在我国常常是“时髦的”。

破产的前夜（在德国）跃进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跃进到中级阶段，而是跃进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在俄国正处在（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初期。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来讲几句结束前一问题的话。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 1895 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中央小组已经在彼得堡开始形成，它必须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 4 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是一种没有什么危险的病症，一经治愈，机体甚至还会更加强健一些。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使我们必须把总指挥部即党的领袖们特别“隐藏起来”，藏得特别秘密，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 1912 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几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许多人早死，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虽然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适当地采用隐蔽的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几百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送去死亡，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的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①。

^①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这个错误，攻

在许多国家里，其中也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地正在派遣而且将来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防范这种危险的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 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肯定无疑地要对这个问题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唱高调，怒气冲冲地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大骂一顿（克·霍纳骂得特别“庄重”和特别粗鲁），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的总计划，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现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实行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

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的党中央。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通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盖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到邓尼金那里去了。

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 000人。十月革命前后，党员人数变动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还比现在少得多¹¹。我们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钻营依附，而这些人是只配枪毙的。最近一次我们大开党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天在尤登尼奇离彼得堡只有几俄里、邓尼金攻占奥勒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以及一般不坚定的人，是决不会指望加入共产党来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的（他们只会因此而受到绞刑或拷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 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每局各5人，由中央全会选出中央委员组成。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在我国，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在工会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

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末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有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多样化的宣传鼓动工作，及时地和经常地召集工会领导者的会议，以及有威信的工会工作者的会议，同时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很少），他们教唆这些信徒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而独立！），直到对无产阶级纪律实行怠工，以及其他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扩大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材来担任管理国家的职务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曾经规定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有权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重视），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懂得：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既然熟悉这种机构，并且观察过这种机构是怎样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的，那末在他看来，什么“从上面”

或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就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废话，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同时，德国左派说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洁的、由非常可爱的（也许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郑重的、非常渊博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我们也不会不觉得是同样幼稚可笑的废话。

资本主义必然给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的、长期形成的职业上和手艺上的差异；一方面是各种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年复一年地才能发展成而且一定会发展成比较广泛的、行会气味比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业和同一手艺），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材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任何其他解决这种任务的办法都是极不认真的，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工会是工人由散漫无力进到初步阶级联合的过渡。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

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些狭隘的行会习气，某些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除了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又一巨大进步，这时候党更需要不仅用旧的方法，而且用新的方法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还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全国经济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非个别行业)手中，然后再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述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无异是害怕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顺利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

动性显得并且一定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狭隘的行会习气、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盘踞”得更加牢固，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自私自利，不顾别人，贪得无厌，形同市侩，在情绪上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西欧的龚帕斯之流，同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在社会面貌和政治面貌上完全是同一个类型。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象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丢尽了丑，并且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去夺取政权），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几天中，即在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带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请参看我在《共产国际》杂志第7、8两期合刊上所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¹²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如

果忘记这个最起码最明显的真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象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实质上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代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这是美国的丹尼尔·德·莱昂派的一种极其确切的绝妙的说法。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参看恩格斯于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¹³）的影响之下。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在如何滥用这个字眼。要想善于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联系），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为了在凡是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是最反动的）里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也就应当善于忍受一切牺牲，克服各种重大障碍。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① 1920年3

① 《人民政治日报》。——编者注

月 10 日所登的材料，英国工会会员，从 1917 年年底到 1918 年年底，已经由 550 万人增加到 660 万人，即增加了 19%。到 1919 年年底，达到 750 万人。我手头虽然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第一次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还浸透了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袖手旁观，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说什么这种联合会将成为（将成为！）广大的工人联合会！！说什么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这个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做出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对革命更有危害的事情来！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打败本国资产阶级和协约国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已经两年半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问，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他们象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

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么一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¹⁴ 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教士、警察和法庭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出去，使他们极不便于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法，保持缄默，隐瞒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无论如何也要在那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1905年以前，我们在沙皇制度下，不曾有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企图捕获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时，我们却派遣了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当时其中有一个是彼得堡的杰出的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时被沙皇的将军杀害），他们在那同群众建立了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把工人从祖巴托夫分子①的影响下拉出来。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特别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种工作是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并且还要系统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对于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以及对于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直截了当地加以谴责，并且建议下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要予以谴责（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

① 费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无非都是祖巴托夫分子，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实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采用一些文明、细致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既然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而且是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制度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度！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末，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度，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

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十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极为严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进行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ebruary^① 1920)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制度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的左派或左的荷兰派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已经认为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根本推翻了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又不再是错误了。他们连一点证据的影子都没有拿出来，并且也拿不出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不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不

① 2月。——编者注

以极端注意、仔细和审慎的态度去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的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仍旧跟着中派”（天主教的“中派”的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无数的反革命军队。”（见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无数的”无产者，不仅还一般地赞成议会制度，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可见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可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异常野蛮和残暴的压迫，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用特别多样的形式造成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成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意志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特别透彻的了解，所以对我们别人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在德国共产党人看来，议会制度自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必须把痛苦的真理告诉他们。你

们必须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修养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无数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甫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 (Grossbauern) 走，那末根据这一点，也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展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什么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必须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甫愚弄的、因闭塞而愚昧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最好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决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到“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度在俄国在政治上

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得久不久，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完全确定了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至于这几次选举曾经产生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万分有益的）政治成效这一点，我敢说，我已经在前面所说的那篇论文中论证过了，该文对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作了详尽的分析。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已经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隶属于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事实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的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上面提到的“荷兰派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如下：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被破坏、社会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关，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参加一切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既绝对没有估计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 1848 年、1870 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 1878—1890 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估计到俄国的经验（见上文），就是合法的斗争和不合法的斗争相配合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目前特定的情况说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权利的共和政府以及一般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必须（有些地方已经做到）把合法的斗争和不合法的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候正在迅速地逼近着。这个极重要的问题，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却是根本不了解的。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 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 年 2 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 年 10 月），不但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不合逻辑到惊人的程度。如果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关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事实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准备）去进行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准备由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苏维埃反对派，就会使解散议会感到困难或受到阻碍。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

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的胜利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的时候，因为在要解散的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不彻底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苏维埃反对派，所以并不感到困难，反而感到方便。提纲的作者完全糊涂了，他们忘记了一系列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所有革命的经验，而这些革命的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和一般“左派”象革命的学理主义者^①那样，在这方面发议论，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认”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的共同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为了证明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个新的真理，荷兰和德国的左派正在象熊那样帮这种倒忙^②。自然，谁要是照旧笼统地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应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

^① “学理主义者”过去在本书中译为“教条主义者”，参看本书第68页脚注。——译者注

^② 这个典故出自《克雷洛夫寓言》，他在《隐士和熊》一篇中描写一隐士和熊做朋友，一天，隐士和熊出游，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熊为了赶走一只趴在它的友人鼻子上的苍蝇，用一块大石头把友人的脑袋砸成两半。——译者注

要小得多，它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抵制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把第一次抵制的情形分析一下，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不能召开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议会外（尤其是罢工）的群众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这个经验对欧洲目前的条件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战时和战后，绝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卑鄙无耻，叛卖变节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革命情绪现在可以说是“新鲜的”或“珍奇的”，人们对这种情绪等待得实在太长久、太枉然、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这种情绪所支配。自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极长期、极艰苦的流血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

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 1917 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 1918 年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使工农痛苦万分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生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它们的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中原因之一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在农民当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采纳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开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逃避”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的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瑞典的泽·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从下面来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

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恶劣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的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度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这种群众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发、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地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和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要顺利地克服这种困难，就非把合法的工作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非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舞台上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制度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要同驱逐不适当的领袖，代之以适当的领袖这种做法结合起来）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这种工作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①。

① 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unista 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期他主编的《苏维埃报》（*Il Soviet*，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出版的第3、4期）、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Comunismo*，1919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出版的第1—4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波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道者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既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又继续奉行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¹⁵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象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中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遗憾。请看看 1874 年恩格斯反驳三十三个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是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之一，这种著作家的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都有极为深刻的内容。

恩格斯说：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宣言中说，——‘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

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来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的。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见《Comunismo》第 3 期）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

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见弗·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纲领》^⑩，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Volksstaat》^⑪ 1874 年第 73 号，引自《1871—1875 年文集》俄译本 1919 年彼得格勒版第 52—53 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致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 1914 年 8 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分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象“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象兰斯柏利同志所提到的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忍受过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作的“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苦难）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

⑩ 《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协丝毫不会使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国的工人都见到过某种形式的类似现象）。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正确断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正象有些杀人案件那样，很难断定它们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必要的自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密布置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①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容许妥协，就会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在自己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把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都抹杀了。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的，那末除了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训练、教育和启发，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表现出最主要的那种不可容许的、叛卖性的、体现着对革命阶级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野蛮的强盗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即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强盗式的“国际联盟”；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不可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成为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

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种蠢话的），居然还能得到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而且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恢复和再生。要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本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¹⁷；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¹⁸（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了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致于象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这个真理。

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实行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老《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订立过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丝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一直继续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但是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揭露他们这班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过短期的正式政治同盟。1903—1912年

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有好几年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斗争（纳坦松死于 1919 年；他当时非常靠拢我们，几乎是一个跟我们意见一致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民粹派）。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订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同盟，我们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而未作任何修改，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毫无疑义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优势压倒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达成协议。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订立（并且不久实现了）正式的政治同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同盟，到 1918 年 7 月甚至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我们，后来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抱着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订立同盟的想法，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些攻击证明“左派”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派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 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6 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总共只占 13% 的席位，社

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历 1917 年 10 月 25 日）上，我们却占 51% 的席位。为什么德国工人这种完全同一性质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没有立刻增加共产党人的力量，却首先增加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动摇于谢德曼派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左倾”幼稚病的无数表现，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到外面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经证明不能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克里斯平、累德堡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该党党员共约 75 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 年）上提议立即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这个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真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一定会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一方面可以便利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的溶合，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制定这样一个适当的妥协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应许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些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许多形形色色的中间阶层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没有分成比较开展和比较不开展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足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而削弱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末就要对那些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让步，当他们倾向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倾向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于那种“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的操之过急的“决议”，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末了，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也是他们确定无疑的错误之一。这种见解象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表达得越“庄重”和“郑重”，越“坚决”和武断，结果就越笨拙。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那种荒谬绝伦的、甚至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订立同盟对协约国作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堡等），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不容许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坐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倒，维也纳苏维埃革命还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滚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要否定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部分地直接危害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加以否定，而且立刻加以否定。能不能顺利地否定这个和约，不仅决定于德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且决定于国际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阻碍了这种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种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放过了

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末，这种罪过就应该由他们去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的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极其强大的国际堡垒）。一定要把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急不容缓地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这该由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去提倡），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末苏维埃德国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忍受为时更久的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帝国主义者做好圈套来陷害德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挑衅说：“你们说出来吧，你们不愿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地对付诡计多端而且目前还比他们强大的敌人，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却象小孩子一样，果然上了这个圈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在工人中间掀起了一种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前途确实无量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如“英国社会党”¹⁹、“社会主义工党”、“南方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²⁰）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它们之间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上述“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根据加入第三国际、承认用苏维埃制度代替议会制度以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来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却是它们在是否参加议会和新的共产党是否加入旧的“工党”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这个“工党”大半是由工联组成的工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也跟“社会主义工党”^①一样，表示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就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的意见不一致了，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见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根本分歧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

① 似乎“社会主义工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德国的表现形式同英国的比较起来，更加同“俄国的”相近)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考查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生产中(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地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着争吵。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党员群众对于议会愈来愈起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赞成 Soviets(俄文苏维埃的英文译音)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或以政治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不应当(所有着重号都是作者加的)支持这帮匪徒。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于革命利益的人将会实行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里。至于韩德逊和克莱尼斯(Clynes)之流已经反动得无可救药了。官方的独立工党越来越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麦克唐纳和斯诺顿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避难所。官方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党员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么方法拥护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给上述这些先生帮忙。在这里英国社会党不起任何作用……这里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生产(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晰的、精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同志们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那我们一定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末，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反动派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证明他们能够象‘主人’自己，象阶级政治家那样，有

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来，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普通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那些善于表达群众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这种（往往是蒙眬的、不自觉的、未觉醒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哪些哪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加拉赫同志这封给编辑部的信，无疑包含着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正在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 1908 年和 1918 年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的萌芽。

该信作者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满怀着最高贵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百姓”都能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该信作者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

该信作者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不论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还是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好家长，但他毕竟是一个最恶毒

的反动派。然而该信作者没有提出，甚至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如果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如果不由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末，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该信作者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本国内部活动着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莱尼斯、麦克唐纳、斯诺顿之流已经反动得无可救药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某种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 1920 年 3 月 18 日的演说（根据 1920 年 3 月 19 日《The Manchester Guardian》^① 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讲中同阿斯奎斯（曾经特别邀请他出席会议，但是他拒绝了）和那些不愿意同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

①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 劳合-乔治证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劳合-乔治所“宁愿称之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那个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工党，就会获得胜利。“这在法国叫作共产主义”，——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是根本赞成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言：“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走到农业区域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里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里离危险还远。那里还没有什么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区域，那里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区域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的危险时始终注意到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里，确定的观念有着巩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荡。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末，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再从劳合-乔治演讲以后所进行的讨论中，引出下面一个插曲，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华莱斯(Wallace)先生问道：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你认为你在工业区域对于这些产业工人所采取的政策会得到什么结果？会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使

目前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先回答说：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失望而被推到工党方面去，现在在工党里已经有相当大部分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在破坏着政府的威信。结果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无疑是大大加强了。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的几次补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一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糊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是这一点也会使资产阶级灭亡的。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改正），但是他们终归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显，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由于他们厂内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又由于想领取补助金而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

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一种思潮的产物，而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超出这种思潮的界限，虽然在人民的头脑里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推翻这些社会爱国派，我们在英国既不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力量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自己的力量，造成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会很快组成政府；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向工党政府实行进攻……”

总之，自由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由百年来的经验奉

为神圣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象复舟时的老鼠一样，纷纷逃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述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 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尝过由这批人组成的政府的滋味，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尝过了这种滋味，那末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必须由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顿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不这样做，就会使革命事业遭到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过来，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转变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造成的，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至少应当知道)：韩德逊和斯诺顿要是战胜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守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末他们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 1 万名兵士跟 5 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 10 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

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一切真正革命的标志，就是从那些到现在还非常消沉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迅速产生出十倍甚至百倍的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物），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这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也可以看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抱着一种不够细心、不够注意、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革命阶级的政党，如果我们要带着群众走（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末，第一、我们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顿去打倒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更确切点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害怕自己的胜利！）；第二、我们必须帮助工人阶级大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认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认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认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认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必须促使这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

流感到失望，将有很大的把握取得胜利，一举而推翻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丘吉尔发生“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发生“摩擦”，自己的力量（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日益削弱，那末将来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不知所措了。

现在我要更具体地来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向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提议“妥协”，提议订立选举协定，向他们说：让我们共同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让我们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在选举时，而是用特别的表决办法投的票数）来分配议席，但同时我们要保留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因为这样做就是背叛；英国共产主义者也绝对必须坚持和保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坚持（从1903—1917年的十五年内）和保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同意在这种条件下结成同盟，那我们就胜利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关心）。我们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亲自出马“煽动”群众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自己的政

府，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共产主义者反对韩德逊之流的全部宣传，我们将毫无顾忌，毫不避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拒绝在这种条件下同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更加胜利了。因为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接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在群众中获得胜利，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那些漂亮的、非常正确的、非常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说明之后，都会同情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获得胜利，还因为那时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偷偷摸摸地力求获得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然去同保守党人携手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 1917 年 2 月 27 日（旧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获得胜利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 1917 年 6 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 13% 的席位）。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极亲密的政治同盟，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①，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

^① 俄国 1917 年 11 月间立宪会议的选举，有 3600 万以上的选民参加投票，其结果如下：布尔什维克得选票 25%，各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得选票 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选票 62%。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无力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末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而使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对我们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号召选民投“拉布分子”候选人的票，反对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都往往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资格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赞成韩德逊而反对劳合-乔治，那他们想必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丘吉尔专政（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好，而且也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正象用绞索吊住绞犯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顿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象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道者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狡猾”，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的”反驳者说：请你们不要把

自己的学理主义^① 强加到群众身上去吧！大概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比英国群众的文化程度不是高一些，而是低一些。可是他们却了解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 1917 年 9 月，曾提出了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 1917 年 11 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而到了 1918 年 1 月 5 日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这种情况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布尔什维克。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的普通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自己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它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末他在这个问题上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复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在 1874 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所犯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

^① 学理主义，俄语为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源出拉丁语。意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论，脱离实际。“意思同“教条主义”相近（“教条主义”，俄语为 *догматизм*，源出希腊语）。这个词过去在本书中译为“教条主义”，为了区别起见，改为现在的译法。——译者注

但是要讲到这点就不仅要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要联系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十 几 点 结 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最落后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不断发展，规模巨大。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次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独立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表明了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怎样产生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苏维埃。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工人运动中，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

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巩固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首先而且主要是同本国的(每个国家的)“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看来,这种斗争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第二种斗争无论在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一致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制度采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毫无疑问,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范围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看到。

但是,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都在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预备学校,以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以后,历史给了它十五年的准备时间,它才获得胜利。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期中就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显得坚强有力,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身分证、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等等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

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主要是的）已经做到了，这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吸引过来，使它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接近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更接近于实际解决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连取得胜利的第一步都做不到。可是，这离胜利还很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

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是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集团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把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而没有醒悟的）群众引导到这种新立场上来，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也要善于在这些群众接近和转到新立场上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没有完全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解决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末，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完全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解决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在革命中得到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那时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在这方

面，甚至那些带有一切小组习气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能做出成绩来的。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布置百万大军（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配置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准备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决不能象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应当以百万、千万来计算。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布置就绪了，以致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约略描写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丘吉尔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这种政治典型各国都有，只是稍有民族差别而已）的分歧以及韩德逊之流和劳合-乔治之流的另一种分歧，从纯粹共产主义，即抽象共产主义，也就是从没有成熟到采取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行动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但是从群众这种实际行动的观点来看，这种分歧却是万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作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上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作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的全部事情、全部任务就在于估计这些分歧，确

定这些“朋友”之间不可避免的、使所有这些“朋友”一齐削弱的冲突何时完全成熟。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以加速韩德逊之流（如果不举出人名的话，那就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即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们）的政权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们在实践中的必然破产，而这种破产恰恰会以我们的精神，以共产主义的方向启发群众；加速韩德逊之流、劳合·乔治之流、丘吉尔之流相互之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君主派之间；谢德曼派、资产阶级、卡普派之间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争吵、冲突和彻底分裂；并且要正确地选择这些“神圣私有制的柱石”之间分裂得最厉害的时机，来进行无产阶级坚决的进攻，把它们全部击溃，并且夺取政权。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的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在政治上更难

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于敌人最危险的、能极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经常（尤其是在“和平”时期，非革命时期）在合法的斗争方面欺骗和愚弄工人，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以为合法的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而只有不合法的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这是不对的。在这样条件下，例如，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在最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闻所未闻的横蛮无耻的手段欺骗工人、禁止人们说这次战争具有掠夺性这一真理的时候，有些政党和领袖不能或不愿意（不要说“不能”，还是说“不愿意”吧）采用不合法的斗争手段，如果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叛徒，那是对的。但是不善于把不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是极坏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作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可悲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用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要困难得多，因而也

就可贵得多。善于寻找、探求和正确判定一种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坚决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别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拿英国来说吧。我们无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那里什么时候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缘由最能唤醒、激起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极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全部的准备工作，四只脚都钉上掌子（正如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时候所爱说的那样）。能引起“决口”、“冲破冰层”的也许是议会危机，也许是由极端错综复杂、日益恶化和日益尖锐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许是什么别的等等。我们谈的不是什么样的斗争将决定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不会发生疑问，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解决了，并且彻底解决了），我们谈的是什么缘由将唤起目前还在沉睡的无产阶级群众行动起来，并且把他们一直引向革命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譬如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当时无论从国际或从国内环境来说，革命形势都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反动军阀千百次无耻行为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意外的”、“微小的”缘由，就能把人民一直引向国内战争！

在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经常不断地、不屈不挠地、毫不放松地利用议会选举，利用不列颠政府对爱尔兰的政策、对殖民地的政策和在全世界范围内施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遭遇的一切波折，利用社会生活中其他一切领域、一切部门和一切方面，并且要在所有这些方面，用新的方法，用共产主义的方法，本着第三国际的精神而不是本着第二国际的精神来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叙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

斗争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外国的共产党人说，这和通常的西欧议会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往往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呵，在你们俄国是这样，可是在我们那里，议会活动却是不一样的”。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世界各国所以要有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的拥护者，正是要在各个方面，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把旧的、社会党的、工联主义的、工团主义的议会工作，改造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我国的选举中，也始终有很多很多机会主义的和纯粹资产阶级的、只顾小利的、资本主义招摇撞骗的行为。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不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方式，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压抑的贫民的帮助下散发传单，走遍工人住所，走遍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的农民的茅舍，深入最普通的平民酒馆，进入最普通的平民公社、团体以及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象在议会中说话那样）跟人民说话，丝毫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要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关和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并使人民了解布尔什维主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除了选举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这种机会的（大罢工当然例外，因为在大罢工时期，这样的全民鼓动机器在我国曾经更紧张地工作过）。在西欧和美国，要做到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是万分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因为不费气力，共产主义的任务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必须把气力费在解决日益多样化的、日益牵涉到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日益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一个个部门、一个个领域的实际任务上。

在英国，还应当在军队中，在“本”国被压迫的、没有平等权利

的民族(如爱尔兰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会党的方式，而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不是用改良，而是用革命)来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要知道，所有这些社会生活的领域，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战后的现在，当各国人民受尽了战争的煎熬而迅速地睁开了眼睛，认清了真相(几千万人死亡和残废只是为了解决是英国强盗还是德国强盗掠夺更多的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处都布满了特别多的易燃物，造成了特别多的缘由，可以引起冲突和危机，使阶级斗争尖锐化。我们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哪颗星星之火(目前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在一切国家都有无数火花从各方面迸发出来)能燃起熊熊之焰，就是说，特别能够唤醒群众，因此我们必须本着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去“耕耘”一切甚至是最陈旧的、最臭气熏人的、看来毫无希望的园地，不然我们将来就不能担负起自己的任务，不能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掌握各种各样的武器，既不能做好准备去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过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现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来把它们破坏了)，也不能做好准备在将来取得胜利之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成功之后，这个革命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出乎资产阶级和庸夫俗子意料之外的多次胜利之后，全世界现在已经变了样，资产阶级到处也都变了样。资产阶级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把它恨到了极点，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加速事变的发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镇压布尔什维主义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许多方面的阵地。一切先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估计到这两种情况。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和克伦斯基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疯狂攻击(特别是从1917年4月起，而在6—7月间就更加猖狂)的时候，做

得“太过火了”。发行数百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用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就帮助唤起群众来评价布尔什维主义；而且除了报纸以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热心”，人们纷纷就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着争论。现在各国百万富豪在国际范围内的举动，也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现在正同过去克伦斯基之流一样，热心地攻击着布尔什维主义；他们在这方面也同克伦斯基一样，做得“太过火了”，因而也帮助了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把反布尔什维主义问题当作竞选鼓动的中心问题，责骂比较温和的或动摇不定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倾向布尔什维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则张皇失措，把成千成万的人当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嫌疑犯大肆逮捕，到处散布关于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消息，造成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就是世界上“最老练的”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它很聪明，很有经验，却也做着难以置信的蠢事，建立了各种经费非常充裕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协会”，出版了专门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书报，增雇了很多学者、鼓动家、教士来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生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因为要“闭口不谈”和窒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办不到了。

但是同时，资产阶级差不多只看到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方面：起义、暴力、恐怖；因此资产阶级特别在这一方面极力准备进行反击和抵抗。在个别场合，在个别国家，在某些短时期内，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也许能够得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够得逞，对我们来说也绝对没有什么可怕。共产主义确实正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长起来”，它的幼芽真是各处都有，“传染病”（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警察很喜欢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

经根深蒂固地侵入了机体并且浸透了整个机体。就是你煞费苦心，“堵住”一个出口，“传染病”也会找到另一个出口，有时甚至是意外的出口。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豕突狼奔，暴怒若狂，肆意横行，做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向布尔什维克预先报复，再设法屠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个、几千个以至几十万个明天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所做的一样。共产党人应当知道，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他们的，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热情同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的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1905年，俄国革命被残酷地击败了；1917年7月，俄国布尔什维克被击败了；15 000多个德国共产党人，被谢德曼和诺斯克协同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将军们用巧妙的挑拨手段和欺诈的阴谋诡计杀害了；芬兰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种种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我们为了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所缺的只有一点，就是一切国家的一切共产党人还没有广泛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各先进国家的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就是缺少这种认识，缺少在实践中运用这种认识的本领。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

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我们要设法使共产党人不要重犯“左派”共产党人所犯的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确切一点说，要更快地纠正，更迅速地、使机体少受损害地消除这一同样的、不过是从另一方面犯的错误。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

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妥协，这就是错误，这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任何形式的变更。

惨绝人寰的、卑鄙肮脏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它所造成的绝境，是这样有力地推动了和加速了世界革命，这个革命广阔深入的发展是这样无比迅速，其变换着的形式是这样无比丰富，它在实践上对任何学理主义的驳斥是这样富有教益，这一切使人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迅速而彻底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幼稚病医治好。

1920年4月27日

增 补

由于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报复，把我国劫掠一空，并且不顾对本国工人许下了怎样的诺言，继续实行掠夺和封锁，我国的出版机构还没有完成出版我这本小册子的任务，这时却从国外得到了一些补充材料。我绝不奢望把这本小册子看作什么超过几篇匆匆草就的政论家札记的著作，因此就扼要地谈几点。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我说“想必”，是因为我仅有新到的两期(第7、8期)左派的《苏维埃报》(*Il Soviet*)，该报正在公开讨论可能分裂和必须分裂的问题，同时还谈到了“弃权派”(或抵制派，即反对参加议会的派别)的代表大会，这一派直到目前还在意大利社会党内。

同“左派”即反议会派(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政治，即反对政党和反对在工会内工作)实行分裂，象过去同“中派”(即考茨基派、龙格派、“独立党人”等等)实行分裂一样，恐怕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就让它这样吧！分裂总比观点混乱要好些，因为观点混乱既

妨碍党在思想上、理论上、革命精神上的发展和成熟，也妨碍党和衷共济地开展真正有组织的、真正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的实际工作。

让“左派”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实际把自己检验一番吧，让他们不要严格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政党，不要具备善于掌握各种活动场所、各个部门、各种不同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本领，而去试一试准备（并进而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吧。实际经验很快就会开导他们的。

不过，必须竭尽全力使同“左派”的分裂不致妨碍或尽量少妨碍工人运动中一切真心诚意拥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地和必要地汇合成一个统一政党的事业。俄国布尔什维克特别幸运的是，他们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群众斗争爆发以前很久，就有十五年的功夫对孟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和“左派”进行系统的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欧美，现在还不得不以“急行军”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工人群众便会迅速而容易地自己联合起来，并且把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党，成为一个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①。

① 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并的问题，我还要指出下列一点。根据我所看到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来判断，前者的长处是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这种类似的现象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止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在个别的地方组织里，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时候在某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部分地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候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采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还不是证明这种策略正确的根据。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和左翼独立党人之间的妥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但是要实现这种妥协并不容易。此后我收到的报纸也证实了这两点。1920年3月26日出版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 Zentralorgan der Kommun.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cusbund^②)第32号上，载有德共中央关于卡普和吕特维茨军事“盲动”(阴谋，冒险)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政府”的“声明”。这篇声明，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它的基本前提是：目前还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基础”，因为“多数城市工人”拥护独立党人。它的结论是：对那个“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政府，应许采取“忠顺的反对派”的态度(即担保不准备用“强力来推翻”这个政府)。

无疑，这个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固然不应当在词句上吹毛求疵，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默不作声地放过去，例如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决不能(在共产党的正式声明上)称之为“社会主义”政府；谢德曼之流以及考茨基和克里斯平之流先生们的政党，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那就不能说排除“各资产阶级资本主

或先进部队，并且除此之外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末毫无疑问，它就必须善于采取无论对于城市的工厂“街道”，或者对于乡村都是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和生动的方法，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② 斯巴达克联盟。——编者注

义政党”这类话；也决不能写下象声明第4条里这样的语句：

“……政治自由可以无限制地享用，而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成为资本专政的这种情况，从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观点来看，对于继续争取无产阶级群众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是极为重要的……”

这种情况是决不会有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如德国的韩德逊之流（谢德曼之流）、斯诺顿之流（克里斯平之流），跳不出也不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圈子，而资产阶级民主又不能不是资本的专政。要达到德国共产党中央所完全正确地力求获得的实际效果，根本不需要写出这些原则上错误的、政治上有害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要讲讲议会的客套的话）：当多数城市工人还跟着独立党人走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决不会妨碍这些工人通过对“他们的”政府的体验去消除自己最后的小市民民主派的（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幻想。这就足以证明必须实行一种真正必要的妥协，即在一定时期内不试图用强力推翻为多数城市工人所信赖的政府。然而在进行日常的群众鼓动，不受官场、议会的客套的拘束的时候，当然还可以补充一下：让谢德曼之流这批恶棍，让考茨基和克里斯平之流这班庸人去用事实揭穿自己如何受骗而又如何骗了工人吧；他们“清洁的”政府，会“最清洁不过地”做一番“清洗”工作，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①打扫干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目前的领袖们（有人说这些领袖已经丧失任何影响，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要比那些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答应“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危险）的真面目，在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叛乱，即卡普

① 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来没有打扫，后来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内扫清。意思是指极肮脏、极污臭的地方。——译者注

和吕特维茨先生们的政变中，又一次暴露出来了①。《Freiheit》（独立党人机关报《自由报》）1920年3月30日和4月14日发表的两篇短文，即卡尔·考茨基写的《决定关头》（«Entscheidende Stunden»）和阿尔都尔·克里斯平写的《论政局》，就是一个小而鲜明的例证。这些先生绝对不会象革命家那样思考和推理。这是一些只会嘤嘤啜泣的小市民民主派，既然他们自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那他们对无产阶级就要更加危险一千倍，因为事实上每当困难和危急的关头，他们必然会实行叛卖……同时却仍旧“真心”自信他们是在帮助无产阶级！要知道，当冒充共产主义者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胆小和没有气节，而认为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状况毫无希望，并且在协约国资本家和协约国刽子手的走狗面前开始哭诉的时候，他们也算是想“帮助”无产阶级的！

三

意大利屠拉梯之流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过，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样一些党员，甚至这样一派议员留在党内是错误的。上述两期意大利《苏维埃报》完全证实了这番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驻罗马记者这样一位旁观者，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3月12日该报登载了这位记者对屠拉梯的一篇访问记。这位记者

① 关于这一点，在1920年3月28、30两日的奥匈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Die Rote Fahne»）第266、267号，1920年，维也纳：L. L.: «Ein neuer Abschnitt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尔·尔·，《德国革命的新阶段》。——编者注]上，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了非常简单、明了而确切的说明。

写道：

“……屠拉梯先生认为革命的危险还没有达到在意大利引起没有根据的忧虑的程度。极端派玩弄苏维埃理论的烈火，只是为了使群众经常处于兴奋紧张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论纯粹是海外奇谈，是尚未成熟的纲领，毫无实际用处。它只能使各劳动者阶级经常处于期待的状态。那些把这种学说当作诱惑物去迷惑无产者眼睛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进行日常的斗争，以获得某些往往是微小的经济改良，好来迁延时日，使各劳动者阶级不致立即丧失自己的幻想，对自己喜爱的神话丧失信仰。因此，一连串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原因的罢工，一直到最近的邮政和铁路部门的罢工，——这些罢工使得已经很严重的国内局势越发严重了。亚得利亚海问题所遭遇的困难，使全国慷慨异常，积欠外债和滥发纸币，使得全国消沉颓丧，但是我们的国家还远未意识到有采用劳动纪律之必要，其实只有这种纪律，才能恢复国内秩序和优裕生活……”

象白天一样清楚，屠拉梯自己及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帮手、教唆者等大概要加以隐瞒、粉饰的真情，却被英国记者泄漏出来了。这种真情就是：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杜果尼之流先生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确实象而且恰恰象英国记者所描写的那样。这完完全全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单拿他们主张处于雇佣奴隶状态的、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工作的工人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一点来说就足够了！所有这些孟什维克式的言论，我们俄国人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承认群众赞成苏维埃政权，这该是多么有价值啊！他们不懂得自发开展的罢工运动的革命作用，这又是多么愚钝，多么象资产阶级那样庸俗啊！对，对，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的记者象熊那样替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帮了倒忙，他最好不过地证实了波尔迪加同志及其《苏维埃报》中的友人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如果意大利社会党想真正拥护第三国际，那就该大张挞伐地把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赶出自己的行列，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共产党。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但是波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却从对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评中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意大利“左派”并不能拿出丝毫郑重的论据来为这种观点辩护。他们简直不知道（或故意忘记）国际上有过这样的范例，即以真正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方式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而对于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又确实是有益的。他们简直想象不出利用议会会有“新的”方式，而一味对“旧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叫喊不休。

他们的根本错误也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坚持的、顽强的工作，便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根本同第二国际传统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留并发展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

就拿报刊工作来说吧。报纸、小册子、传单等都是用来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一个多少文明一点的国家里，任何群众运动都非有报刊机关不可。尽管你大叫大嚷反对“领袖”，尽管你赌咒发誓要保持群众的纯洁，使他们不受领袖的影响，究竟还不能使人不利用那些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做这个工作，还不能使人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种工作所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气氛和环境。甚至在推翻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已经两年半的时候，在我们周围还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私有制的关系大量存在（在农民和手工业者当

中)的这种气氛和环境。

议会活动是一种工作形式，报刊工作是另一种工作形式。如果在这两方面做工作的人，真正是共产主义者，真正是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的党员，这两种工作的内容都可以是共产主义的，而且应当是共产主义的。但是，无论在前一方面或后一方面(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无论在哪一方面的工作中)，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要战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见和影响，要削弱小资产阶级环境的阻力(然后进而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环境)，都不可能逃避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种种必须解决的独特的任务。

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各国非常“左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物都痛骂议会制度，嘲笑被资产阶级庸俗化了的社会党议员，抨击他们钻营的行为，如此等等，可是他们自己却通过报刊工作，通过工团(工会)工作，去干同样的资产阶级式的钻营勾当。当时我们在各国看到的这样的例子难道不是非常多吗？只就法国来说，难道茹奥和梅尔黑姆这些先生的例子，不是典型的吗？

“拒绝”参加议会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无耻透顶的钻营行为，对议会的肥缺的资产阶级式的享用，对议会工作的惊人的改良主义曲解，卑鄙的市侩陋习，——凡此种种，毫无疑问都是资本主义到处产生着的，不仅在工人运动之外，而且在工人运动之内产生着的通常的和最流行的特点。然而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环境(这种环境，就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逝

得很慢，因为农民经常产生资产阶级），在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着形式上稍有差别而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钻营勾当、民族沙文主义和市侩庸俗习气等等。

可爱的抵制派和反议会派啊，你们觉得自己“异常革命”，事实上你们在跟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时却被一些比较小的困难吓倒了，而你们一旦胜利，一旦推翻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会产生同样的困难，而且是大得多、大得无可比拟的困难。你们象小孩一样，被今天摆在你们面前的小困难吓倒了，却不懂得在明天和后天你们还必须学习，必须补习怎样去克服同样的然而大得无可限量的困难。

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钻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里来。他们将钻进苏维埃，钻进法院，钻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材，就不能建设也无从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象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贫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贫这种偏见。在苏维埃政权下，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目空一切地、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又会复活起来（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得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法律辩护员”²¹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

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种人们习惯了的、被资产阶级偏见所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们驱逐出党，是很“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极有限的）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很“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建立真正不愧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党团，是很“困难的”；要使共产党议员不干资产阶级议会的无聊玩意，而在群众中从事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很“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很“困难的”，从前在俄国很困难，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得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解决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末，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党团，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末，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不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

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就是不得不仓卒补课，而这种匆忙补课，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平常犯更多的错误，会比一般表现更多的弱点和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一定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不惬意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的。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场所，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克服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简直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本中，我谈到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革命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为的地方，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着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本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列宁同志：

由于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出版以前，就有可能读到它。在您的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政策上所起的作用，您再三着重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极少甚至根本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谨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

兄弟的敬礼！

戴·伊·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注　　释

- 1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于 1920 年 4 月写成，增补部分于 5 月 12 日写成。该书俄文本于同年 6 月 8—10 日出版，该书的德文本、法文本和英文本差不多在同时即在 7 月相继出版。为了使这本书能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出版，列宁曾亲自校阅该书清样和机样。该书曾分发给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1920 年 7—11 月期间，该书在莱比锡用德文再版，在巴黎用法文再版，在伦敦用英文再版。

在这本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之尝试)》。但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该书的一切版本上，这个副标题都没有印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中，这部著作是按照列宁校对过的该书的第一版刊印的。——第 1 页。

- 2 龙格主义是法国社会党内以让·龙格为代表的中派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龙格派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龙格派口头上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仍然同无产阶级专政为敌。他们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 年 12 月，龙格派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一道脱离法国社会党，参加所谓第二半国际。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们又回到第二国际。——第 11 页。

- 3 美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于 1893 年成立。该党的首领是詹姆斯·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等。独立工党实际上是“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第 11 页。

- 4 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84 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的、极端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关于费边社分子的评述，见列宁下列著作：《〈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54—355 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51 页)、《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国理论》(《列宁全

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37—238 页)等。——第 11 页。

- 5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 1917 年 4 月。

1920 年 10 月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党内大部分人于 1920 年 12 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2 年“独立党人”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 12 页。

- 6 斯巴达克派是 1916 年 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领导下成立的“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德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列宁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98—313 页)、《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第 18—72 页)等和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76—91 页)，对德国左派的错误作了批评。1917 年 4 月，斯巴达克派加入德国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在该党内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德国 1918 年 11 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 12 月建立德国共产党。——第 15 页。

- 7 “拉布分子”是列宁对英国工党 (Labour Party) 党员的称呼。——第 18 页。

- 8 荷兰“论坛派”是列宁对荷兰共产党党员的称呼。论坛派最初是 1907 年创办《论坛报》(«De Tribune») 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派集团。1909 年，论坛派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工党，组成为独立的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是荷兰工人运动中的左翼，但它不是一贯革命的政党。1918 年论坛派参加了建立荷兰共产党的工作。——第 23 页。

- 9 霍纳即安·潘涅库克。——第 24 页。

- 10 《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 Arbeiterzeitung»)是 1919 年脱离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派)的“左派”共产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的机关报。该报在 1919 年到 1927 年间出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曾要求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放弃宗派主义的策略，加入德国共产党，但他们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后来“左派”共产党人的上层分子滚到反革命那边去了。——第 24 页。

- 11 党员人数自 1917 年二月革命后到 1919 年变化如下：到 1917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会议时，共有党员 8 万人；到 1917 年 7—8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约 24 万人；到 1918 年 3 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时，至少有 27 万人；到 1919 年 3 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时，为 313 766 人。——第 28 页。
- 12 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0 卷第 220—244 页。——第 32 页。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 108—109 页。——第 33 页。
- 14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 W. W.）是美国的工人组织，成立于 1905 年。该组织的活动带有显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特点，如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拒绝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工会中进行工作。“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后来变成一个对工人不起任何作用的宗派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第 35 页。
- 15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 1892 年，当时叫“意大利工人党”；1893 年它采用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名称。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左翼力量加强了。1921 年 1 月在里窝那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同社会党决裂，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第 45 页。
-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585—586 页。——第 47 页。
- 17 列宁指的是 1836 年 11 月 29 日恩格斯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批评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地方，他说：对他们说来，理论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 436 页）。——第 51 页。
- 18 见《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论文选》1948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550 页。——第 51 页。
- 19 “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1 年成立于曼彻斯特。该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非机会主义的，真正不依赖自由派的”政党（列宁）。由于党员数量少和脱离群众，它带有某种宗派主义的性质。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党内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海德门为首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一派是以阿·英克平等人为首的国际主义派。1916 年 4 月，党内发生分裂。海德门及其同伙占少数，退出了该党。此

后，领导英国社会党的是国际主义者。英国社会党是1920年成立的英共²⁰党的发起者。——第57页。

- 20 “社会主义工党”是由脱离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社会民主党人左派集团于1903年组成的。“南方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是主要由威尔士煤矿工人组成的一个小集团。“工人社会主义联盟”是由“妇女选举权保障协会”产生的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主要是由妇女组成。

英国共产党成立时（成立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8月1日举行）将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加入工党的一条列入自己的纲领，当时所有“左派”组织都没有加入共产党。在1921年1月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南方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当时称作“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同英国共产党合并，称为“英国统一共产党”。“社会主义工党”的领导者拒绝合并。——第57页。

- 21 “苏维埃”“法律辩护员”，即法律辩护员委员会，1918年2月设立，直属于工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该委员会于1920年10月撤销。——第91页。

书 号 1001·25
定 价 0.23 元